

制度变迁、公共选择 与和谐发展

岭南经济论坛 2007

2
论
坛
7

广东经济学会 主编

对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

公共选择与政府职能转型

房地产市场发育与住房体制改革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教育体制改革 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 劳动力市场与劳资关系调整
房地产市场发育与住房体制改革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教育体制改革 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岭南经济论坛 2007

制度变迁、公共选择 与和谐发展

广东经济学会 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变迁、公共选择与和谐发展/广东经济学会编.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17 - 8661 - 9

I. 制… II. 广… III. 经济制度 - 中国 - 文集 IV. F1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693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 economyph. com](http://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李晓岚 (电话: 010 - 68353496)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B5

印张: 29 字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661 - 9/F · 7640

定价: 4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 电话: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社会和谐需要构建健全的公共选择机制

—— 序言

改革开放的 30 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1978 - 2007 年间，我国 GDP 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在 9.5 - 9.8% 之间。在这样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中，持续的高速增长超过了一代人以上的的时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是什么构成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基础呢？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多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计算和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与资源投入量的各自贡献率，并进一步实证地指出了这种生产率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利用率以及研发投入在 GDP 中的比重增长等。无疑，这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逻辑的一种解释。不能说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但是，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化改革之前所形成的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改革的支撑性作用。

我们知道，私人财产与公用设施是任何社会稳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两类资产。公用设施的存在可以使私人投资以较低的交易费用获取更高的回报。这种公用设施主要是指与人的生命周期相关的社会服务设施，诸如基础教育程度、医疗保健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缺乏必要的公用设施，那么，人口生产与再生产就难以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类公用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往往依靠政府进行投资，而不能指望私人投资来满足整个社会对这类产品的公共需求。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虽然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即当时的人均 GDP 相当于 300 美元左右，但是，整个社会在发展识字教育与基本医疗保健方面形成了一套基本的保障体系。与印度比较就可以看出我国当时的公共设施基础优势。在 1981 年，我国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估计已经高达 68 岁，而当时的印度平均寿命是 54 岁。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每千名新生儿 37 名死亡，而当时的印度是 110 名。此外，在 1982 年，我国 15 - 19 岁年龄组的识字率男性已经达到了 96%，女性为 85%。而当时的印度相应的数据为 66% 和 43%。这些数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公共设

施的保障能力，这也是我国在 80 年代初期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起点。这种公共设施体系成为促进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直接而有价值的投资。虽然在计划时期形成的公用设施并不是为了支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客观上支撑了这种改革的持续深化。

市场化改革主要以私人投资快速增长为特征，而公用设施并没有伴随着同步增长。1998 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在比较印度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差异时对我国经济的实践评价道：“80 年代中国的私人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公用设施进一步发展并不十分成功。主要原因有，第一，改革后从经济活动产品集体优先占有的体制，诸如改革前的公社制转变为地方公用设施由私人收入的税收融资，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公用设施的财政基础。第二，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诱使人力资源离开收入机会较低的公共部门，诸如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地区的教师与医生等。第三，在社会服务设施公共部分的管理中扩大使用了“企业责任制”模式，普遍采用了使用者付费以保证收回成本。”^①

在市场化改革推动的经济增长中，公用设施的规模与体制并没有伴随私人财产增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形成了现阶段我国，特别是广东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些不和谐问题。这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人们对教育、住房以及医疗保健服务质量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需求，原有的公用设施服务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这种对公共设施服务质量与规模不断增长的需要。虽然持续 30 年的快速发展大幅度降低了我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即每天低于 1 美元的人口比重从 1990 年的 31.5% 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8.9% (世界银行，2008)，使我国跨入了小康阶段，但是，相当一部分公用设施的服务体系仍然停留在生存阶段，无论是公用设施的覆盖范围、服务标准与运营机制都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这是我国公用设施长期缺乏必要投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第二，随着我国人口跨地区流动的增长，特别是离土离乡的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越来越多，诸如广东省外来工就有大约 2000 万人口之多，原有的公用设施管理体制也会面临着挑战，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中，公用设施在不同地区与不同行业的标准因财政能力不

^①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让·德雷兹 (Jean Dreze):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5-86 页。

同而有所差异，而人员的跨地区流动对这种不同标准的公用设施服务体系产生了极大冲击。这既涉及公用服务体系的地区标准问题，也涉及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问题。第三，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公共产品的供应者也为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这使许多公用设施服务体系不完全由公共开支解决，而需要动员私人力量与资源参与到公用设施的供给增加与改善上来。那么，由私人提供的公共产品该如何定价，私人提供与公共部门供应的公共产品之间的边界如何确定，特别像住房、医疗保健以及基础教育等都存在着私人进入与公共部门提供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显然，私人资源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规则与机制与公共部门是不同的，既不可能要求进入公用设施的私人部门服从公共部门的规则与定价，也不可能把私人部门的运作机制照搬到公共部门中去。这就需要在新形势下解决这些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新问题。

广东省经济学会基于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省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反思确定了 2007 年岭南经济论坛暨广东经济学会年会的主题，即公共选择与社会和谐。目的在于，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现实问题提出经济理论方面的多视角思考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经验。论文集大致分为这样 5 个方面的专题，即公共选择与政府职能转型、房地产市场发育与住房体制改革、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保健制度与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与劳资关系调整等。在所收集的这些论文中，不乏许多真知卓见，这里暂不具体评述，只是就上述 5 个方面的专题，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公共选择与政府职能转型是一个覆盖其它几个专题的基础性问题。因为公用设施的服务体系主要是靠地方政府提供的，为什么改革开放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公用设施服务体系没有伴随着私人财产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呢？难道是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吗？答案是否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1994—2006 年间，广东省 GDP 总量由 4619.02 亿元增加到了 26204.47 亿元，以现价计算，大约增长了 4.7 倍，这已大大快于广东省同期工资性收入与消费的增长率。而财政收入由 569.38 亿元增加到了 5122.25 亿元，增长了 8.0 倍；地方财政收入也由 270.83 亿元增加到了 2179.46 亿元，增长了 7.0 倍。在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下，地方政府本应该将相应的财政收入用于公用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上来，这是其承担的职能所在。但是，地方政府也没有把公共开支更多用于公用设施体系的建设方面上来。原因何在？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重要的，一

是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体系。以 GDP 作为考量业绩的主要甚至惟一指标的评价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把公共开支主要用于最有利于 GDP 增长的项目上来。二是公共决策的内部与外部制衡与约束。在公共开支项目中,谁来约束与制衡地方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者的选择偏好呢?这也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第一个因素上,这是不够的,这需要对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具体的系统研究。

房地产市场与住房体制改革是一个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来房地产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价格与供求之间存在着市场经济的互动调节。然而,一旦非市场因素,诸如利益集团等介入房地产行业后就会使其价格出现扭曲。许多学者提出了政府作为一个公正主体而介入房地产市场,其目的在于保障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介入方式一方面通过税收抑制需求,另一方面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提供廉租房,而在于政府提供廉租房的标准应该如何确定。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廉租房的标准过高,地头过好,那么,入住廉租房的低收入群体都不愿意通过提高收入而尽快搬出来,其结果,政府提供多少廉租房都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的。在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一定条件下,提供廉租房所花费的支出增多了,其它方面的改善就减少了,或者说,用于改善其它公共服务的支出增多了,而用于提供廉租房的支出就减少了。在这种公共选择中,谁说了算?地方政府的选择偏好主要来自于当时的上级要求,还是通过诸如人代会对政府预算的公开审议来加以制衡。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教育体制改革。这本论文集集中的一部分文章涉及了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问题。分配公平主要来自于机会公平,而机会公平与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相关,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创造一个教育公平的社会机会。一方面在区分非义务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前提下,更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挖掘社会潜力投资教育,创造更多的人们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对社会资源向教育部门配置的动员需要与政府税收机制结合起来,诸如设立各种教育基金等,对贫困家庭学生安排教育资助与补贴以及通过市场方式进行教育信贷等。在非义务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不仅这个方面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而且这个方面也还有相当的潜力可挖。另一方面随

着人口的跨地区流动,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异地是否会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等。如果这部分是由地方政府支付的,这就会涉及地方政府之间关于教育费用的转移支出,其结果交易费用是比较高的。与其如此,不如将义务教育纳入中央政府的开支,从而使流动人口无论流动到任何一个地区都会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

医疗卫生保健体制是事关民生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二是医疗保障的供给能力。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医疗保障基本上是覆盖全社会的,虽然城乡的医疗保障所享有的医疗设施与服务供给程度不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些医疗服务机构弱化了医院的公共服务目标,而变成了盈利性组织,这造成了一些低收入群体因病返贫。特别是长期以来员工的医疗保健基本上是由单位支付的,每个单位的支付能力不同而造成不同单位的差异。消除这种差异的途径在于打破单位界限,由地方政府用统一标准覆盖全社会,这不仅包括了其所管辖的不同单位,也包括了城乡。这是现阶段主要解决的医疗卫生保健的福利问题。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医疗保健的供给能力问题。这种供给能力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换句话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标准也会相应地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需要与个人支付能力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目的在于通过个人对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支付费用对个人享有的医疗服务进行一定约束,而不是无限制的使用医疗资源,特别不能以级别划分占用与使用医疗卫生资源的多少。

劳动力市场与劳资关系调整也是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基本关系问题。改革开放的30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正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比如说,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作用下,我国农村地区的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流入城市或发达地区,留在本地的劳动力资源日益减少。在劳动力供给日益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会趋于上升。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加工企业出现的“招工难”反映了这种供求变化的现实,一些地方政府连续出台提高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也是对这种变化的一种反应。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因政府干预而超出了市场供求所调节的限度,那么,这不仅改善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反而会影响劳动力就业。比如说,为了健全对劳动力的各种保障制度,需要由企业主支付各种保障性费用,诸如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教育培训等。在整个社会范围看,进行这个方面的制度建

设是大势所趋，但是，每个项目所支付的费用是否为企业所承受，这是需要讨论的。因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目的是试图保障劳动力的基本福利，但是，企业为降低这个方面的开支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聘用，其结果，劳动力就业机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可能降低了。因此，这种干预就达不到促使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

总之，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已经汇集在我们这本论文集中，我希望这些理论成果对公众理解与反思现实中的问题能有作用，对政策制定者的思路扩展能有帮助，对经济学的理论推进能有贡献。

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 王珺教授

2008年5月写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参考文献

- [1]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让·德雷兹 (Jean Dreze).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中文版) [M]. 黄飞君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 印德尔米特·吉尔 (Indermit Gill)，霍米·卡拉斯 (Homi Kharas). 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中文版) [M]. 黄志强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目 录

序言 社会和谐需要构建健全的公共选择机制	王 珺 (1)
----------------------------	-----------

公共选择与公共部门改革

公共选择与和谐发展

——理解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和挑战	李永杰 (1)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黄 挺 (12)
我国公共选择制度的缺陷与改革	缪国亮 (21)
用辩证思维看待公共部门改革	许卓云 (26)
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部门改革	于海峰 谢 颖 (33)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以广东省 21 个地市为例	黄 燕 杨振斌 孟繁邨 (41)
试论市场制度与性别分工	李健英 (52)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代际公共品供给	李郁芳 孙海婧 (63)
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及其政策涵义	蔡 彤 (72)
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影响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杜金岷 高 洁 (81)
对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探析	
——以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为例	
.....	杨 平 黄丽霞 刘丽娟 (90)
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初探	刘小玲 (99)
中国的财政政策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性分析	周建安 (105)
全球化对广东制度变迁的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	何一鸣 (115)
在改革中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吴奕新 (122)
管理创新思路——如何切实推进政务公开	孙 博 (128)

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内涵的再认识

- 基于公共服务外部性的思考 贾丽虹 (135)

医疗、教育、住房体制改革

- 广东医疗保障的现状评价与发展对策 郑方辉 邓艳利 (147)
- 构建全民基本健康保障体制与社会和谐 黄灼明 张亚芬 (155)
- 2007 广东公众医疗保障满意度研究报告 郑方辉 (161)
- 教育费用攀升与教育投入机制 李江帆 (172)
-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中美比较
- 基于菲德模型的检验 姚益龙 谢中秋 刘晋华 (179)
- 试论教育投入与教育公平 郭颂平 张 伟 (194)
-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演进的基本历程及其特点分析 蔡俊兰 (202)
- 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等问题 董志强 (210)
- 论健康教育
- 以广东省为例 储小平 黄晓军 陈 戈 (217)
-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深层思考 张亚芬 逯登宇 (223)
- 关于住房体制改革的反思与深化 周治平 (231)
- 消除房价泡沫, 建立住房保障, 维护社会公平 陈 池 刘泽华 (238)
- 广东房地产宏观调控若干问题研究 林 洪 温 拓 (244)
- 政府限价下的住房交易定价模型研究 王 升 (253)
- 发挥税收作用 稳定住房价格 杨卫华 蔡丽莹 (264)
- 广东省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黄小彪 左连村 (272)
- 廉租住房制度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思路 杨永华 (282)

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

- 广东区域人才、就业结构与区域差异分析 李培祥 (293)
- 技能型人才短缺的原因与治理: 基于珠三角的分析 何亦名 (302)
- 大学生就业保留工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张建武 崔惠斌 (312)
- 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APEC 的实证研究 王 兵 吴延瑞 (321)

中国劳动力成长实证分析	鄢 平 (329)
论劳资合作博弈中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基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分析视角	吕景春 (341)
企业劳动契约期限和劳动力供需缺口关系的	
理论和实证研究	李 湛 姚建华 (349)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罗明忠 (360)
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及其对广东省的启示	
——基于精算分析的研究	展 凯 申曙光 (368)
论构建保证失地农民收入流的制度体系	潘光辉 (376)

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广东进入新阶段的新特征和战略选择	李惠武 (385)
更加注重民生和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做好广东残疾人	
工作对策研究	王利文 魏伟新 (393)
我国当前社会不和谐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叶祥松 (402)
和谐社会构建中反贫困“双轨制”模式的并轨研究	陈端计 (409)
正确引导培育新社会阶层促进社会和谐快速发展	余 欣 梁育民 (417)
试论新时期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社会和谐	周运源 (427)
我国建设和谐社区的评价体系研究	刘军琦 (436)
外部性、权利冲突与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以居民小区规划建设变电站引发的分析	王廷惠 (447)
后记	(452)

公共选择与公共 部门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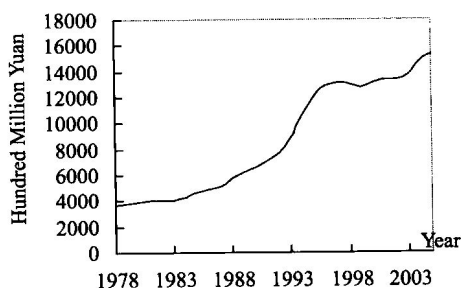
公共选择与和谐发展

——理解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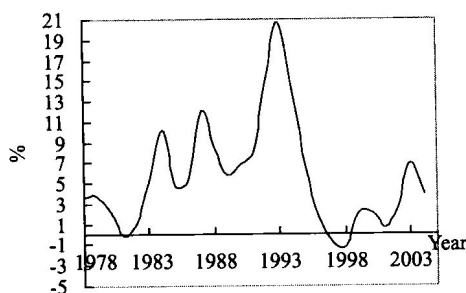
李永杰^①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成就与挑战并存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和民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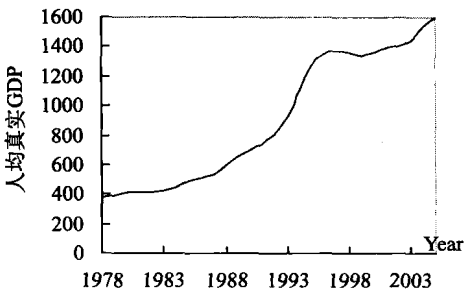


(a) 中国真实 GDP (1978 - 2005, 以 1978 不变价格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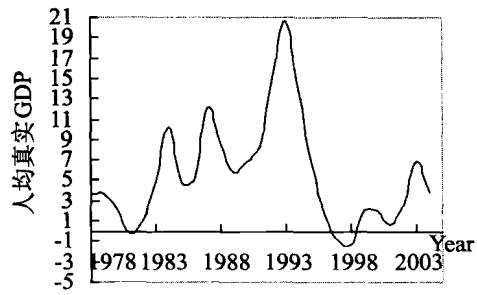


(b) 中国真实 GDP 增长率 (1978 - 2005, 以 1978 不变价格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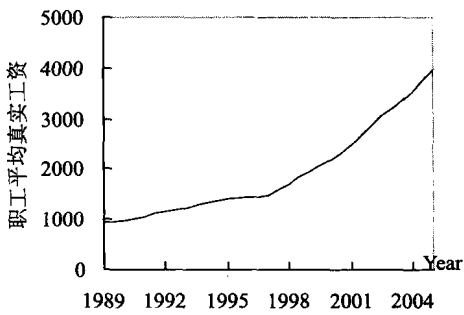
^① 本文为作者在广东经济学会 2007 年会上的主题发言报告。作者感谢感谢温思美教授、许卓云研究员等与会人员的有益评论；感谢董志强博士对文稿的有益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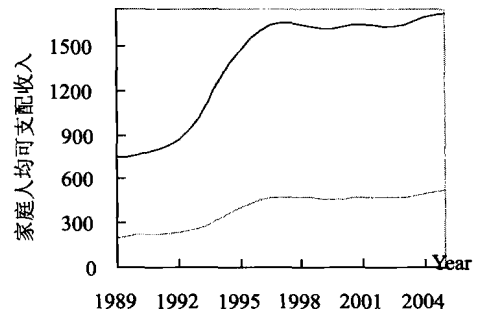
(c) 中国人均真实 GDP (1978 - 2005, 以 1978 不变价格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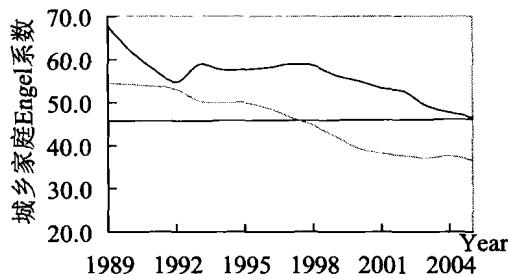
(d) 中国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 (1978 - 2005, 以 1978 不变价格计)



(e) 职工平均真实工资变化 (1989 - 2005, 以 1978 不变价格计)



(f) 城乡家庭人均可收入 (1989 - 2005, 以 1978 不变价格计)



(g) 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 (1989 - 2005 年)

图 1 中国经济的长期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6)

从图 (e) 到图 (f) 中, 我们可以确认, 我国经济总量以及人均国民收都有了非常巨大的增长, 并且在长期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

费开支结构都有了改善，生活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提高。

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都毋庸置疑。在上述图表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经济变量的考察，也一样可以佐证发展的巨大成绩。譬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我国1990年尚有3.6亿贫困人口（以每日每人消费支出不足1美元为标准），到1999年贫困人口下降到2.33亿人，到2002年则下降到1.61亿人；贫困人口比例的变化为，从1990年31.5%下降到1999年的17.8%（到2002年的12.5%）。这一成就的显著性并不只是由其迅速的绝对减贫数据来反映。如果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绝对数是在不断增加的事实，那么对中国减贫的成就就应给予高的评价。据世界银行（2003）估计，1987-1998年全球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了800万，而中国以外的贫困人口数目却增加了8200万。这意味着，全球减贫事业中，中国是一个成绩卓著的主力国家！

但是，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存在的。即便从我们前面提到的各项资料中，也很容易发现一些持续并日益严峻的问题。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现象和问题。

（一）近10年发展缓于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不明显

图1（e）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职工的真实工资有了相当快速的的增长，但是图（f）却表明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时期增长并不明显；如果将真实工资增长率与真实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放在一起（图2），可以发现，在1992年到1997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平均的工资率增长速度，而1998年以后则情况刚好相反，工资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而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长。对于农村家庭，虽然缺乏总收入变化数据，但是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也表明最近十年人均纯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既然这里的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表示了家庭可用于各种生计和投资的财富，那么可以说这十年人们可支配的财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理解了这样的现实，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十年来“上学难”“买房难”“看病难”会成为城乡居民不堪重负的压力。没有钱，做什么都是困难的。

（二）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Gini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0.2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当时全球所有国家中是最大的，而1999年更上升到0.437（世界银行，2003b），2005年更达到了0.467（联合国统计数据）。不排除数据可能有出入，但是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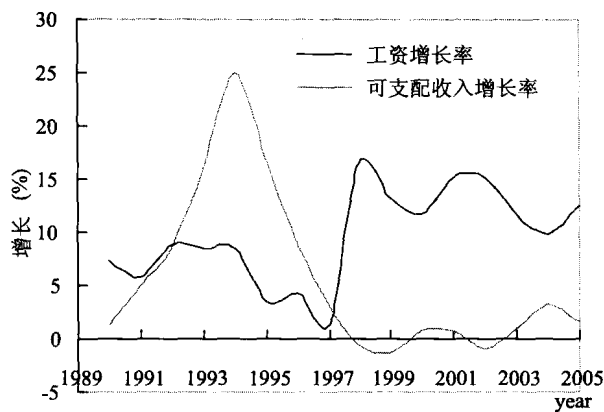


图2 人均真实工资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1990 - 2005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整理

在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探索中，陈宗胜等（2001）对1990年 - 1999年的收入差距进行了解，认为城乡差距是第一因素；这与万广华（2006）的结论是一致的。图1（f）和（g）可以看出，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并且这一差距在1992 - 1998年间迅速扩大，1998年以后则基本保持较大的差距，缺口略有增加；就生活水平而言，城镇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农村生活水平（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一直高于城市，且差距缺口在1990 - 2000年持续扩大，2001年后有所缩小）。如今的中国，乡村及其居民正在被市场经济边缘化。农民，正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董志强，2001）。

第二个成因是地区差距。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给出地区收入差异的数据，但是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我国经济改革中各个地区虽然都有长足的增长，但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非常突出（世界银行，2003b）。

在许多正式文献中，有所忽略的一种收入差距成因是行业的报酬收入成因。垄断行业薪酬是近年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由于很难获取研究所需的微观数据，因此在研究上人们未能以足够的证据证明当前收入差距主要是受到了这个因素的影响。但就直观感受而言，许多人相信在同一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中，垄断行业的暴利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得不到足够准确有力的数据，但是考察一下各个行业的工资离散趋势，可以发现行业真实平均工资差距的确不断拉大（图3a），其中被认为仍处于垄断行业的电煤水生产供应（D）、金融保险（I）、交通运输邮

电通信（G）三个产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业（N）是真实平均工资最高也增长最快的行业；农业（A）和竞争比较激烈的批零餐饮业（H）工资水平及增长都较低。最高平均工资行业和最低平均工资行业从1989年到2002年的真实平均工资差距从617.35元上升到3853.7元，级差扩大了约6.2倍。由于平均工资并不是一个可精确测度差距的指标，它至少没有包括这样的事实——工资更高的行业可能也有更高的福利；工资更高的行业人们拥有更多财富进行物力或人力资产投资，而这将提升个人的非工资收入。因此，考虑非工资收入，那么收入差距将远高于以真实平均工资估计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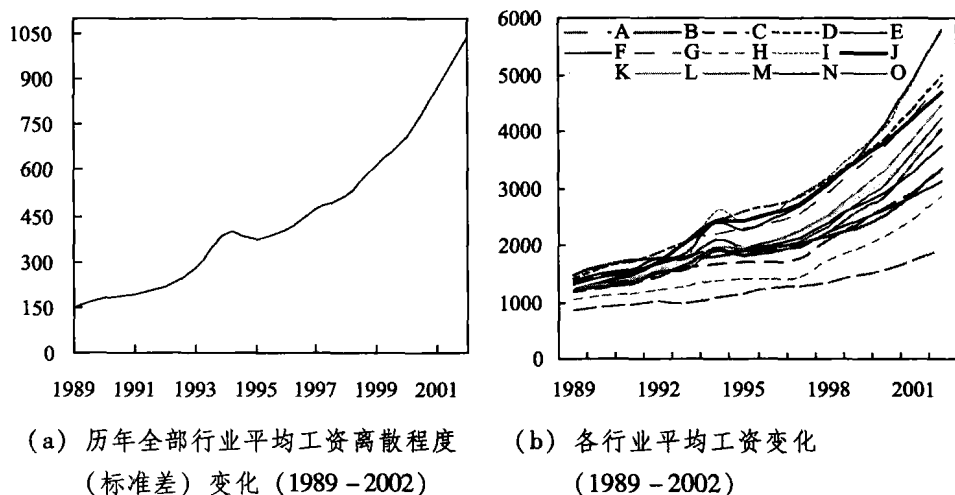


图3 各行业平均工资变化与离散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整理。其中：A为农林牧业，B为采掘业，C为制造业，D为电、煤、水等生产和供应业，E为建筑业，F为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业，G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H为批零餐饮业，I为金融保险业，J为房地产业，K为社会服务业，L为卫生体育福利业，M为教育文化影视业，N为科研技术服务业，O为政府政党机关社团。

（三）相对贫困的增加

与收入差距扩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事实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绝对贫困虽然在减少但是相对贫困却在增加。绝对贫困是一个与个人维持基本生存的能力相联系的；相对贫困则是与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们对于贫困更多的是从绝对贫困方面考虑，现在对于贫困的概念则更多地考虑了相对贫